

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年，336頁。

《清朝とは何か》是日本清史學界部分學者總結近十年清史研究的論文集，此著作以相對簡要的表述方式撰寫，旨在向日本學術界概要介紹清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對外國學者在短時間內瞭解日本清史研究動向很有價值。

我們需要將本書置於日本清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來理解其問題意識的由來。日本清史研究發端於江戶時代，隨着向亞洲擴張而展開。滿族史和東北歷史地理是二戰前史學研究的重心，此外尚有社會科學框架下中國社會研究的傳統。在戰後歷史學宏觀背景下，利用漢文史料的明清社會構造研究成爲清史的主流。但是戰前滿族研究傳統也被「《滿文老檔》研究會」繼承下來。與「社會構造論」學者從農村社會出發不同，滿族研究者更加注意從統治者角度把握清朝政治結構。由於利用史料語文的不同，戰後日本清史學界分爲滿族史與中國史兩個群體。1980年代「社會構造論」學者轉向地域社會研究，但在近20年地域社會研究後，發生了如何把握清朝國家總體形象的疑問。在此背景下，關注統治者政治結構的滿族史研究受到重視，兩大群體交流日益密切，以八旗制度爲切入點討論清朝國家統治結構成爲清史學界熱點。另一方面，繼承內亞研究和東亞研究傳統，超越一國觀念，在亞歐大陸、環東亞海域的世界史背景下討論清朝位置也逐漸展開，並進而考慮以清朝爲基點如何去思考世界史上「近世」的問題，本書即是這一轉向的產物。本書作者群的主體是以岡田英弘爲代表的滿族史、蒙古史等亞歐內陸研究者。

全書共四部分，卷首是岡田英弘的專訪，相當於全書總綱。第一部份「清朝爲何」五篇論文分別將大清帝國置於中國史、世界史、滿洲政權發展中討論其位置，並從作爲被統治者的漢人角度和作爲統治者的滿洲族群認同角度檢視其形象。第二部分「清朝統治體制」七篇文章以八旗制爲核心，討論大清帝國多重複合的統治體系，既討論了八旗制內部的多民族構成，又通過考察準噶爾帝國、西藏的歷史揭示清帝國因地而異的統治方式，更通過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的外交，說明清帝國對外關係的多樣性，從而展示了清帝國統治秩序的多樣性與柔性專制的特點。第三部分「統治體制外所見的清朝」中，岸本美緒從面對「後十六世紀挑戰」的東亞、東南亞諸國家出發，提出不同於歐洲史脈絡的「近世化」思考。杉山清彥則從歐亞大陸「帝國時代」的角度出發，考察了後蒙古時代大陸帝國的存在形態。渡邊美季、中村

和之、楠木賢道等則主要以東亞諸地域間資訊交流和相互觀感角度出發，試圖在環東亞海域世界中把握清帝國的形象。由於本書作者大多是在岡田英弘的總體構想下展開具體研究的，因而論點及所論事實較多重複，故本文集中概括介紹岡田、杉山等人的基本學術共識，而不逐篇分析。

岡田英弘和宮脇淳子在〈大清帝國之前中國史概說〉和〈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中，提出中國史分期觀和世界史始於蒙古帝國的看法，作為全書的立論基礎。以元朝統一至甲午戰敗為中國文明的第三期，當中又以清朝遷都北京分為前後二期。甲午戰敗為後中國時代，即中國放棄中國文明，接受日本的現代化模式的時期。蒙古帝國是蒙古貴族統治下多民族多宗教的遊牧帝國，第一次將歐亞大陸東西部聯繫起來。另一方面，日本與地中海世界為了對抗蒙古帝國對大陸東西貿易的壟斷，各自開始發展海上商路，新航路開闢和東亞倭寇都應置於這一背景下理解。據此他認為世界史始於蒙古帝國出現的13世紀。元朝退出中原後，其政權一直存在於長城以北的草原地帶，在前元朝領土上出現了南北朝的格局，即長城以南統治漢人農耕地域的明帝國與長城以北統治蒙古遊牧草原的元帝國，杉山清彥在〈從滿洲國家到大清帝國〉一文中具體論證了大清帝國與蒙古帝國的承繼關係。努爾哈赤先得到漠南蒙古贈給的汗號，後北元宗主、成吉思汗後裔投降女真軍，將象徵元朝正統的傳國玉璽「制誥之寶」獻給皇太極。皇太極將此解釋為自己承繼了成吉思汗所受的天命，於是接受滿洲、蒙古、漢人的推戴，即皇帝位，國號改為大清。因而亞歐大陸東部的歷史脈絡並非傳統理解的「元—明—清」序列，而是「元—北元與明的分裂—清」，大清帝國自北元處取得正統性，並南下統一前元朝的領土，大清帝國是作為蒙古帝國的後繼者而非明帝國的後繼者出現在世界歷史上的。

岡田英弘進而在〈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中提出，中國的2,200年的歷史，並非同一王朝模式的延續，不同地域種族集團建立的王朝體系各自不同。因而統一與分裂也不是簡單的循環，而是因主導統一的人群的差異而改變着王朝模式。作為大清帝國原型的後金國，誕生於多族群（女真、蒙古、漢人）、多生產方式（狩獵、遊牧、農耕）共存的遼東地域。所以在建立政權之初，滿洲國家就不是一個如蒙古帝國般狹隘的部族政權，而是發展出一套對應於多民族的制度設計，並且隨着領土的擴大，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統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成立之初的大清帝國是以皇帝與宗室旗王共同統帥的八旗為核心，以外藩蒙古王公與漢族三順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為兩翼，基於八旗型主從關係建立的女真、蒙古、漢人的聯合政權。自入關至18

世紀，西藏、明朝、伊斯蘭世界的回部被納入統治秩序，大清帝國成爲五大族群的同君連合（personal union）國家。滿洲的成功在於通過八旗制保證獨自認同的同時，兼具對不同政治傳統的靈活適應能力。

杉山清彥在〈大清帝國的統治結構〉中具體論述了作爲大清帝國核心的八旗制的特點：組織單位爲金字塔型階層體系，縱向的汗－旗王身份秩序，橫向的並列體制，汗（皇帝）的強大控制力。

村上信明在〈由民族視點看大清帝國〉中分析了八旗制在多民族統合中的作用。八旗制中的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兼具旗人的廣義「滿洲」身份和蒙古人、漢人的民族身分，這種交錯的族群制度結構使得大清帝國不是單一的滿族政權，而是複合型政權。

杉山清彥在《大清帝國的統治結構》中進一步指出雖然大清帝國建立了官僚制，但帝國統治卻非單純依此運作。旗人出任政府官職後仍需對其所屬旗王負責，並且在更多情況下，八旗制下的主從關係更爲重要。而且皇帝通過因血緣（宗親、姻親）、時間、空間（包衣、侍衛）的接近而產生的親信，建立起一種非正式的「側近政治」。這兩個特點使得清帝國的行政呈現出複合性格，也使得君主有多種管道來進行政治控制。

在八旗制之外，清帝國統治集團在不同地域，針對不同族群，根據其各自文化與制度傳統，採取不同的統合方式，適用不同的原則與制度，展現出帝國的多面性的特質。對旗人和滿洲舊地（旗地）而言是八旗制的滿洲王朝，在舊明朝領域則延續儒家禮儀秩序和官僚制度，對漢人而言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王朝，與藩部實行結盟。宮脇淳子的〈大清帝國和準噶爾帝國〉及山口瑞鳳的〈清朝和西藏〉具體分析了這一過程。最高統治者因而也同時集諸多身份於一身，他是汗和上三旗旗王、皇帝、承接成吉思汗天命的大汗、藏傳佛教的大檀越和轉輪聖王、文殊菩薩皇帝、伊斯蘭世界的保護者。鈴木真在〈雍正帝的政治〉中具體分析了這一點，補充了此前由宮崎市定描述的作爲中國皇帝的雍正帝形象。這一特點不僅表現在對帝國內的統合方式上，也延伸到對外關係上。柳澤明在〈清朝與俄羅斯〉中指出大陸東南部環海的儒教世界由禮部管理，根據明朝的朝貢秩序處理對外關係；而西北歐亞內陸世界的諸藩部則由理藩院管理，對俄羅斯事務也歸理藩院管理，大清帝國統治不是以華夷秩序中皇帝的身份，而是以大汗的身份與俄羅斯進行平等交涉的。

綜上，大清帝國是以八旗制爲核心的剛性原則與統治手段的柔性運用的結合，可以稱爲一種滿洲型「柔性專制」。

岡田英弘在〈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中進而分析了大清帝國性質的改變。面對俄羅斯對新疆的領土侵蝕及其支持下的回民叛亂，清朝將新疆改為省，標誌着清帝國放棄部族聯合的政權結構，開始從同君連合走向一體化的國民國家。

最後杉山清彥在〈近世歐亞大陸中的大清帝國〉中將視野擴大到同時代的亞歐大陸，分析了17、18世紀出現的俄羅斯帝國、大清帝國、莫臥兒帝國、薩法維帝國、奧斯曼帝國、準噶爾帝國的共同點：興起於古老文明的邊境、多民族多文化複合性、帝國是多統治形態的地域集合體和文書行政高度發達。這些特點的源頭均可追溯到蒙古帝國，故這些帝國可以被認為是蒙古統治原則的剛性中核與柔性手段結合創造出帝國群，這一個「帝國的時代」也可以視作發端於蒙古帝國的世界史的「近世」。

多語言史料可以揭示多重歷史世界、多種秩序的存在。漢文史料或是漢人所寫，或是其他族群的人為漢人而寫，單純利用漢文史料來建構清朝史，只能揭示漢人眼中的清帝國或清帝國展示給漢語世界的形象，從而造成「作為中華帝國歷史上一個王朝的清帝國」的認識偏頗。因此需要超越漢文史料中心主義，充分利用滿文、蒙文史料，以及藏文、維吾爾文，從各自主位（Emic）的視角追尋歷史脈絡；同時注意俄文、中亞文字、日本、朝鮮、琉球的史料，通過外在的觀察來補充內部史料的局限，最終描述出多面立體的大清帝國歷史形象。

申斌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

**沖浦和光著，桑田草譯，《極樂惡所：日本社會的風月演化》，台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8，294頁。**

本書原名《惡所の民俗誌—色・芝居町のトポロジー》，2006年由文春新書出版社出版。作者沖浦和光生於1927年，為日本大阪桃山學院大學名譽教授，他的研究重點一直放在日本歷史上處於社會邊緣的賤民，這些賤民被排除在士（武士）農工商的身分制度以外，一般被稱為穢多、非人、制外者，後來又被稱為部落民、被差別部落。而本書集中討論這些社會邊緣民中的兩類人物——遊女（妓女）及役者（演員），以及他們的生活空間——遊里（風化區）及芝居町（即劇場街），遊里及芝居町位處都市的邊緣，被統稱為「惡所」。「惡所」這個稱謂，反映了統治者及主流社會對社會邊緣人的